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工作报告

张希清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先生创立的一个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1982年10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为“相当于系一级的研究所”。2000年12月，被正式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领导下，按照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五项标准和邓广铭等先生所制定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现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科研体制改革等五个方面简要报告如下，请批评指正。

第一，在科学研究方面：根据社会需要，发挥传统优势，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本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11人，兼职研究人员6人，其中有北京大学外系的教授，有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也有兄弟院校的教授，另外还有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参加了我们主持的重大项目。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政治与制度史、中外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史，以及历史文献（包括汉简、敦煌吐鲁番文献、古地图及其他历史典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制定了“十五”规划，先后设计了六个重大项目，吸引了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跨学科、长时段的科学研究。三年来共出版了32部学术著作和180多篇论文，取得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关于六个重大项目，已经向各位专家、领导呈送了书面材料，过一会儿还有三位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作专门汇报，我这里只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第一个重大项目，是阎步克、邓小南主持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综合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 （1）阎步克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 （2）陈苏镇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 （3）刘后滨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 （4）张希清的《宋朝科举制度研究》（待出版）；
- （5）邓小南的《祖宗之法与北宋前期的政治》（待出版）；
- （6）张帆的《元帝国的政治文化特性》（待出版）。

上述六部著作有三部是侧重政治制度的，有三部是侧重政治文化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这些著作不是面面俱到的总结性叙述，而是不同朝代、不同领域的开拓性的专题研究。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唐代的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宋朝的科举制度和“祖宗之法”、元代的政治文化特性等一系列方向上都取得了明显突破，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收获。已经出版的阎步克的《品位与职位》得到了广泛好评；陈苏镇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则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第二个重大项目，是荣新江、李孝聪主持的“古代中外关系：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1) 荣新江、李孝聪主编的《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

(3) 李孝聪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ps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文物出版社即出；

(4) 荣新江、朱玉麒整理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

(5) 朱玉麒的《西域水道记》(校勘本)，中华书局待刊；《徐松与嘉道间的西北舆地之学》，三联书店待刊。

上述六部著作有的侧重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如李孝聪的著作就是他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中文古地图研究的成果。全书共选录中文古地图225幅，其中绝大多数未曾公诸于众，有部分彩绘舆图更是独家收藏，弥足珍贵。有的著作侧重新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如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利用许多最新出土或最新发现的文物和史料，翔实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粟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贡献，是借考古文物新发现和国外史籍以进行中外文明交融研究的上品佳作。本项目的参加者还撰写了28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美国、葡萄牙、日本、韩国及港台地区的刊物上用多种文字发表，使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直接起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三个重大项目，是张希清、邓小南主持的“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主要成果有：

(1) 宋德金的《金朝史》，待出版；

(2) 刘浦江的《二十世纪辽金史研究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3) 宋德金的《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 刘浦江的《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日本]《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

(5) 张希清、田浩、黄宽重主编的《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待出版；

(6) 于建设、田广林主编的《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考察报告集》，待出版。

10—13世纪是宋、辽、夏、金对峙或鼎立的时期，不同历史积淀、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异质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在痛苦中迸发出新的因子，导致中

国文化的融合与更新。上述论文和著作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格局出发，从“碰撞与融合”这一视角着眼，对10—13世纪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的冲突、沟通与整合进行了总体研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如宋德金的论文从“双陆”这种源于古印度的博戏，在魏晋、隋唐、两宋及辽、金、元朝的传播历程，不仅折射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反映了外来文化传入后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轨迹。本文大都是创新之见，纠正了以往的某些错误，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些空白。

第四个重大项目，是李孝聪、罗新、臧健主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信息、文献和图像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其主要成果有：

- (1) 臧健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图书资料网络联合目录数据库”（已完成）；
- (2) 李孝聪、成一农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数字化图像信息库”（正在建设中）。
- (3) 李孝聪主编的“北京旧城庙宇分布图与资料数据库”（正在建设中）。
- (4) 罗新、叶炜编纂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及全文检索数据库（已完成）；
- (5) 李孝聪的“中文古地图数据库”（正在建设中）；
- (6) 王小甫的“丝绸之路研究——地图、图像与文献的网页”、“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多媒体数据库”（正在建设中）等。

快速、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信息，充分发掘和使用各类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提高研究水准、开拓研究领域、实现创新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传统中国古代史研究长期形成了学者个体独立搜集资料、独立研究的模式，不仅费时费力，难以避免重复劳动，又使研究本身缺乏及时、全面、准确的国内外信息交流与学术资源的共享。上述数据库的建设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迈向数字化、现代化的一种初步尝试。虽然大部分课题仍在进行中，但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数字化图像信息库”，编制了101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数字化历史城市地图，显示了名城的起源、城市选址、发展演化、布局形态与功能结构。既可以为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提供形象化资料，又可以为我国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第五个重大项目，是邓小南、荣新江主持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 (1) 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如荣新江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邓小南的《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刘浦江的《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等；
- (2) 指导博士生完成了作为本项目组成部分的四篇博士论文。如余欣博士的《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李全德博士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中枢体制》等。
- (3) 邓小南、荣新江主编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论文集和考察报告集。（正在编纂中）

上述论文和著作集中在对于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研究。这些研究初步显示，正是“流动”与“秩序”的矛盾互动、相辅相成，正是二者反复的冲突与激荡、在新基础上不断

的整合与重建，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生生不息的分合演化过程。这些论著注意参考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突破中国古代的王朝体系，着眼于探索长时段的发展演变，以跨越唐宋时段作为着眼点，探索不同层面的社会人群、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交错变化的历史轨迹，不仅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而且取得了学术发展史意义上的深入，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正面“对话”。

第六个重大项目，是王小甫主持的“3—14 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 (1) 王小甫的《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 (2) 刘浦江的《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 (3) 王小甫的《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待发表；
- (4) 罗新的《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 (5) 王小甫、罗新主编的《北方部族与中古中国——野外考察报告与专题论文集》，正在编纂中。

还有值得特别汇报是，我们还根据“带课题、带经费进基地”的精神，将“北大创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重大项目——“盛唐研究工程”纳入本基地的研究计划之中。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包括吴宗国教授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教授主编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教授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教授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等五种六册。这一批研究成果，不仅总结了二十世纪唐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外唐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这套丛书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学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二十一世纪唐史研究的报春花”。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进行了报道。

此外，还有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入本基地进行研究，一个是邓小南主持的“唐宋时期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研究”；另一个是荣新江主持的“石刻史料所见中外汉唐文化交流史”，第三个是王小甫主持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注意采用长时段、多学科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方法，推动了科研的深入开展。

(1) 我们的研究课题不局限于一朝一代，从“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3—14 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这类课题名称即可以看出，其时间跨度少则 4、5 百年，多则上千年。我们感到，只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研究，才能看清楚这些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

(2)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各课题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十数次田野考察。如“3—14 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不但到山西、陕西、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察，而且组团到蒙古国进行了 10 余天的田野考察。通过田野考察，把“读万

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把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一是可以搜集现有文献中没有的史料，二是亲临历史现场，可以大大增强历史感。

(3) 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采用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多侧面、立体地剖析和认识历史。

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开发新课程和吸收研究生参加课题组等措施，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促进“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三年来，在本基地专职研究人员指导下毕业的硕士生 21 人、博士生 8 人、博士后 2 人；在读的硕士生 28 人、博士生 26 人、博士后 2 人。可以说，本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培养中国古代史专门人才的基地。主要措施有：

(一) 三年来，我们利用科研成果开设了 13 门新课，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使研究生直接接触学术前沿。如阎步克的多媒体“中国古代史(上)”，先后被北京市和教育部评为“精品课程”。李孝聪的“比较城市史：地图、形态与文化”，被评为“全校优秀课程”。荣新江撰写的《敦煌学十八讲》一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精品教材”，荣获北京市第七届社科成果奖一等奖。

(二) 邀请外国及港台访问学者，共同开设研究生课程。如 2003 年秋天，我们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柏清韵(Bettine Birge)教授，与邓小南、张希清共同开设了“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读书讨论课；2004 年夏天，邀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黄宽重研究员，与荣新江、邓小南共同开设了“唐宋史研究”专题课，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三) 吸收研究生参加课题组，在科研实践中提高科研能力。如在荣新江、李孝聪、王小甫等老师的指导下，不少研究生参加了“盛唐研究工程”和“3—14 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等项目，在《盛唐研究丛书》等书中，就收有这些研究生的成果。

(四) 通过科研与出国访学，也加强了科研队伍的建设。如阎步克入选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荣新江入选为“部属院校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又如陈苏镇曾到日本大学访学一年，罗新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使中青年学术骨干也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第三，在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方面：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图书资料的数字化，努力建设中国古代史图书资料信息基地。

(一) 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们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 三年来共举办了数十次学术讲座，召开了 4 次国际学术会议、6 次国内学术会议：

2001 年 6 月 5—9 日，在北京召开“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界的 42 位著名学者（其中海外代表 21

人），通过论文发表、专人评议和集体讨论，进行了多学科、跨学科的广泛交流；会后又到山西考察了有关文物古迹。

2001年6月27—30日，与美国西北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唐宋的宗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港台地区和大陆的近40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2001年10月6—8日，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举行“盛唐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15—16日，在北京举办“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12月，与上海师大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古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4年4月23—25日，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在北京联合举办“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展览；

2004年7月19—23日，在北京举办“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赴山西大同地区进行学术考察；

2004年7月24—29日，与赤峰市人民政府在赤峰市联合举办“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赴翁牛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进行学术考察。

(2) 出国及赴港台地区访问一个月以上者9人次，一个月以下者有数十人次；接待国外及港台地区学者来访一个月以上者12人次，短期交流者则有上百人次。

(3)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签订了正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使本研究中心开始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地。

(二) 本研究中心成立20年来，收集、保存了较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文献资源。目前拥有中外文藏书已达3万余册，期刊100余种，其中不少属于珍贵文献，大约有30%以上是校图书馆所没有的。有鉴于此，从2001年7月起，本研究中心资料室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第一批分馆。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本馆已经利用SIRSI与CALIS系统软件，初步建成了“中国古代史图书资料网络联合目录”数据库。每月在互联网上发布新购图书，现已经发布23期。校内外很多单位的研究人员从北大网上了解到本中心的馆藏，纷纷前来阅览与查询。其中不仅有本校外系的师生，还有外校、外省及港台地区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访问学者、研究生、进修生。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9—12月阅览人数为1843人，2004年2—7月为2524人。其中教师、博士生占52%，硕士生占32%，进修生占16%。

图书资料的数字化对于强化、提高图书馆储存、检索文献的功能与效率，实现校内资源共享；改善研究环境，增强为研究者服务的能力；建立、扩大与国际学术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建设全国性的中国古代史图书资料信息基地，本研究中心在及时大量购置纸版图书的同时，还大力加强数据库和互联网站的建设，独立创办了自己的互联网站。现已注册并投入使用的网站域名为：<http://ww.cnhistory.net> 和

<http://www.pku.edu.cn/academic/zggs/>。现在通过互联网可以全文检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二十五史》等；还有上边提到的我们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一些数据库。

第四，咨询服务方面：面向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开展咨询服务，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三年来，本研究中心尽力做了一些咨询服务工作：

（一）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制定文物保护和旅游规划提供咨询服务。如王小甫等参加了高句丽山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座谈会和电视片的拍摄工作；李孝聪参与了北京文物局“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的调查与论证。

（二）为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提高大众文化素质服务。如2003年张希清曾担任文化部艺术展览中心“中国科举文化展”的顾问；罗新曾协助中央电视台《千秋史话》栏目组到大同、晋北地区考察，给予咨询指导。

（三）参加应用部门委托的研究课题。如臧健曾多次作为联合国儿基会的专家，考察西部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向教育部提供报告和建议。

第五，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建立科研新体制。

本基地还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主要有：

（1）实行机构开放，主要是研究课题开放，学术活动开放，图书设备开放。

（2）实行科研项目责任制，坚持人员流动原则，鼓励竞争创新。

（3）正确处理与有关院系的关系。如在人才培养方面，与历史系密切合作。历史系主要负责行政管理，本基地主要负责业务指导。

（4）健全基地管理体制。学校设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基地建设领导小组，作为本基地的决策领导机构；同时，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本基地的学术研究指导机构。基地主任则负责实施学校和学术委员会确定的发展规划，聘任专兼职研究人员及行政和资料管理人员，负责学术交流、财务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实践证明，这一管理体制是行之有效的。

上述汇报肯定有不少不足之处，比如我们在咨询服务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恳请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批评指正，我们一定会努力改正，争取将本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谢谢大家！

（2004.9.8）